

天涯精品系列丛书

特别报道卷

韩少功 蒋子丹 主编

让世界重新洗牌

天涯

人民出版社

让世界重新洗牌

特别报道卷 韩少功 蒋子丹 主编

I15
1005



Frontier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让世界重新洗牌/韩少功 蒋子丹 主编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3.1

天涯精品系列丛书

ISBN 7-222-03434-x

I .让... II .①韩...②蒋... III.报告文学—作品集—世界—现代 IV.1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69509号

总策划: 胡廷武

组稿编辑: 项万和

特约组稿: 子寒

责任编辑: 宋家宏 潘灵

封面设计: 韩家英

天涯精品系列丛书

让世界重新洗牌

韩少功 蒋子丹 主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云南出版印刷厂印装

开本: 787 x 960 1/16

印张: 14

字数: 276千

2003年1月第1版

200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6000

ISBN 7-222-03434-X

定价: 26.00元

CONTENTS 特别报道卷目录

001
[泣血追踪]
..... 谭深 等

066
[来自深圳的报告]
..... 严凌君

039
[都市边缘的孩子]
..... 赵铁林

084
[“新人类”观察]
..... 苗凡辛

052
[南街村见闻]
..... 曹锦清

097
[青春偶像崇拜透视]
..... 岳晓东

CONTENTS 特别报道卷目录

108

[因特网:让世界重新洗牌?]

黄北雁

150

[亚洲经济泡沫的破灭]

雷斯 范闻彰

182

[匈牙利纪行]

房宁

122

[毒潮叙思录]

单正平

164

[地下室里的西西弗斯同志]

[美]乔治·派克 著

韩刚 译

194

[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的
来龙去脉]

梁文

136

[中国:入世不入套]

邵人原作

黄原改写

171

[传媒控制下的美国]

李宪源

203

[晏阳初与平民教育运动]

[美]赛珍珠 著

林特湜 译

泣血追踪——关于原深圳致丽玩具厂

11·19大火受害打工妹的追踪报告

谭 深 等

组织者的话：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谭 深

早在一年前，《天涯》的主编从朋友那里，知道我在做致丽玩具厂大火的追踪调查，就约我写有关文章。我一向仰慕《天涯》，当即答应，可是迟迟未交稿。蒋子丹终于不得不催，并说了一句让我听来很重的话说：“我想这件事对你可能挺边缘的……”几年来，追寻劫难后的打工妹和她们的亲人，一次次捧着死难者的遗像遗物，一遍遍听着伤生者的诉说，致丽玩具厂，投入了我太多的牵挂，引发了我太多的思考。我没动笔，是我不敢轻易动笔，又怎敢言“边缘”啊！她可能在激将，迫使我将寻访的“第一时间”的所见所闻拿出来，和每一位关注中国打工妹、关注中国弱势群体的同仁分享。

原致丽玩具厂，当时的全名是“深圳市葵涌致丽工艺制品厂”，坐落在龙岗区葵涌镇，港资企业，是“香港致高实业有限公司”所属工厂之一，主要生产意大利CHICCO公司品牌的玩具。1989年建厂，1993年11月19日发生特大火灾，当时厂内400多工人，结果死难87人，有名单的伤者51人。死者中，有两位是男工，其余都是打工妹。

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发生在外商投资企业中最惨重的事故。

致丽大火，震惊了中国，震惊了亚洲，媒体的报道铺天盖地，中央派出调查组，深圳成立事故处理小组。很快，死者家属得到抚恤，伤者得到治疗，事故责任人受到制裁。致丽成为历史，在人们的记忆中慢慢地淡去。

但是，要想完全抹掉这样一场灾难的影响也难。火灾的受害者——伤者以及死者的亲人仍在承受着苦难，后来我知道，还有一些以劳工权益

为己任的香港劳工组织和慈善组织、内地工会中的研究者，一直在为遭受劫难的打工妹奔走伸张，争取权益。工运学院的教授常凯，曾随调查组进入火灾现场，收集了200多封被遗弃的打工妹书信（《天涯》2000年第5期已选登其中部分书信），写下感人至深的《废墟上的凭吊》一文；香港的劳工和慈善组织，几年来不断看望和接济着烧伤最严重的几位打工妹，他们还奔走于意大利和香港之间，给CHICOO公司施加压力，要求它们给予致丽大火的受害者以赔偿。

1993年底，我和合作伙伴得到一笔来自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做一个关于打工妹的课题，从此和打工妹结下不解之缘，也和许多研究劳工的学者和援助者成为好友。1995年前后，我认识了常凯，见到他收集的一部分书信，又随他到深圳的葵涌镇，开始了对致丽的第一次调查。

真正的投入是在1998年，同样是在香港中文大学亚洲研究所“交论文”的催促下，我开始写《打工妹的内部话题——对深圳原致丽玩具厂百余封书信的分析》。我一遍遍地看，仔细地辨认着她们之间的关系，一个个打工妹的形象和故事凸现出来了。如今这些文字依然鲜活，叙说着打工妹们年轻的人生经历，但我不知道她们之中哪些已不在人世，哪些能够幸免于难，内心的震撼和哀痛难以名状，强烈的追踪念头萌生出来，但我能怎么做呢？

就在此前后，香港的朋友找到我，说意大利那个公司的款项已经到位，存放在香港一家天主教中心，但是该中心没有任何名单，他们已有的名单也有限，希望北京的朋友帮忙，将款项发到受害打工妹或她们的家属手里。这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我当然毫不犹豫。我开始奔波，希望通过正式途径办理此事。后来我知道，事情比我的想象要复杂。我和香港的朋友都是帮忙的，我们不是任何一方的当事人，不具备正式的身份，除非我能找到国内合法组织，愿意而且可能无偿地投入这项工作，或者我认识某位有职有权的人物……总之，我和北京另一朋友分别运作，都失败了。事后反思，其实办法可能还会有一些，可是我们来不及尝试，意大利方已发出最后通牒：如果在两个月内找不到全部名单，款项收回。无奈之中，我们将已有的名单交给香港的那个天主教中心，由他们与该公司协商，聘请律师解决此事。

转眼到了1999年，致丽大火已经过去了近六年，我的研究计划不能再拖延下去了。经人介绍找到家在重庆的北大研究生刘成付和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李强，利用暑假帮我做开创性的工作——在重庆一带寻访名单上的人，就此开始了对致丽追踪的第一次调查。

我将已有的几个比较准确的地址，建议他们可以按照“滚雪球”的方式扩大寻访的对象。访谈提纲很简单，最主要的是找到更多的人。送别他们出门，望着两个年轻人远去的背影，我忽然感到有点难过：我交给他们的是一项困难的工作，地址不详，分别在几个不同的县，山区的路不好走，真难为他们了。

李强是位细心周到的姑娘，每到一地，她都会打电话给我，汇报他们的情况。我的企盼中更多的是担心，嘱咐他们一定要吃好住好，把安全和健康放在首位，找到多少名单在其次。这次调

查一共20多天，用去他们大部分暑假，历经重庆市、丰都县、忠县的5镇6村，得到14位死伤打工妹的信息，其中死者6人，伤者8人。

11月份，我自己有了一点时间，决定动身去重庆做第二次调查，并邀刘成付同往，小刘爽快地答应。

在重庆见到香港亚洲专讯研究中心的朋友小廖，她带来一个令人气愤的消息：由于没有全部名单，好不容易争取到的意大利那个公司的款项挪作他用，致丽打工妹一分钱也没有得到。现在香港的几个劳工组织准备再次给公司施加压力，把那笔款要回来，但关键还是名单。

义不容辞。看来我们的研究计划只有搁置，先在名单的数量上下功夫。

这一次，访谈了死者家属、伤者和原致丽厂的工人等18人/户，又得到原致丽厂员工名单45人，其中死者27人，伤者5人。最重要的，我大致弄清楚了原致丽员工的主要来源地是重庆的忠县一带和河南的沈丘一带（详见“重庆：第二次追踪报告”）。

兵分两路。香港的劳工组织在力争意大利公司的补偿，他们的运作我不得而知。而我，目标是尽可能找到更多的名单。因为很明显，名单越齐全，受害打工妹得到补偿的可能性越大。

很快2000年的寒假又到了。我找到人大的两位研究生——重庆籍的贾云竹和河南籍的马彦，请他们再各找一位伙伴，分做两组，到重庆到河南做再一次的寻访。

又是一次艰苦而富有成效的调查。重庆一路到了三个县的5个镇/乡，访谈12人/户，得到名单30人，其中死者5人，伤者8人；河南一路历经两个县中的7镇8村，访谈22人/户，共得到名单27人，其中死亡10人，受伤6人。

这样，我们的追踪共得到有地址的死难者名单40人，受伤者27人。我把名单全部提供给了香港的朋友。加上一些未访到的，致丽厂受害者的名单接近百人。

重庆：第一次追踪报告

刘成付（执笔） 李 强

我们的调查是从一个炎热的夏日开始的。1999年7月下旬，我们抵达重庆，便到重庆某电机厂找杨勤英的哥哥——我们是从信封和笔迹上知道这个名字的。谭老师特别吩咐我们，尽可能找到这个人，因为正是在致丽工作的两个妹妹的汗水，供他上了大学。而在他刚分配工作4个月，想接两个妹妹来重庆看一看的时候，一场惨烈的大火发生了。那两个姐妹的命运如何？是我们急切想知道的。刚早上九点多钟，地上已经像下了火。人事处的人听我们说明来意，肯定说，该厂没有一个叫“杨勤X”的小伙子。在我们的要求下，他们又翻出了从1992 - 1995年接收的大学毕

业生登记表，结果确实没有找到。也许是信中厂名写错了？我们又跑到另一家电机厂，谁也不知道有这个人。我们只好放弃了。看起来很是出师不利。是啊，仅仅从一些残留的只言片语便想找到信中的主人，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次日，我们查了地图，仔细地选择了寻找路线，决定沿江而下，先从丰都找起。由于有座著名的景点——“鬼城”，丰都到处是浓浓的商业气氛。可是我们根本无心关顾这一切，此刻，我们最急迫的是寻找那些在喧嚣的人流物流之中寂寞的打工妹。

添云是大火的受伤者之一。根据谭老师给的香港朋友提供的地址，我们先找到了添云的哥哥添成。遗憾的是，添云不在，她随她丈夫到湖北去了。添成给我们斟上茶，坐在我们对面，他一边不停地抽烟，一边回忆添云受伤前前后后发生的事情。添云到致丽厂打工刚两个月，还没拿到致丽厂一分钱，大火便发生了。她辛苦工作的唯一结果便是留下了一个伤残之躯：深二度64.7%的烧伤面积，除脸上外，手、肩、背、腿、脚等各部位几乎全被烧伤。添成去处理添云的事时已经是多日以后了，因为家里人怕他闹事，没敢马上告诉他。见到妹妹时，添云仍然只能躺在床上，不能翻身。添成坚持要求去看火灾现场，当地政府不让他去，后来他和一个朋友自己去了，并且拍了照片。添成说，“这是她（妹妹）一生的转折点”。为了照顾妹妹，他特地从原来的工作地调回了丰都。添云现已结婚，并有了一个女儿。我们用电话跟添云联系。听说我们是专程从北京去采访她的，添云颇感意外。经她哥哥在电话里再三解释，她才肯谈谈自己的情况。目前她最大的困难是伤口没完全治好，经常化脓，植皮无法排汗，手不能伸直，在家里也只能干一些较轻的家务活。丈夫的工作单位垮了，添云便跟丈夫一起到湖北打工。受伤后添云获得了厂方及香港方面的慈善捐款共25万元，其中包括每月275元的生活费，从出事时起到50岁止，但这些钱大多用在了医药费、手术费中。我在电话中很小心地问添云以后有什么打算，她沉默了好久，最后什么也没说。添云的房子就在她哥哥的房子下面。几年前添云在楼下开了一个小卖部，但生意极为冷清，她到湖北后便由哥哥和嫂子下班后代为照看一会儿。我们在小卖部里坐了半个多小时，竟没有碰到一个人前来买东西。添成一再要求我们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他说，比起那场大火中别的受难者来说，他妹妹还算是较好的，幸运的。他说其实他们没有任何奢望，只是希望有关部门对她妹妹这种情况该优惠就优惠，该落实就落实，不要只说而不做。

A镇AA村是一个偏僻的山村。从丰都县乘车一路颠簸，顺利的话，也得三个小时左右才能到达。廷芳家在一个离公路尚有半个多小时山路的山坳里。我们边走边问，翻过了一个又一个小山坡，路旁玉米正是成熟的时候，硕大的玉米结在玉米秆上，鼓胀欲裂。坡上梯田里的稻谷正在抽穗，远远望去，如锦缎一般。这个无人知晓的山村里一个同姓家族中竟有三人同时经历了致丽大火的劫难：廷芳（死亡），廷英（死亡），廷芬（受伤）。

我们碰巧在路边碰到了廷芬（伤者）的父亲，他推着一辆半旧的老式载重自行车正要到邻镇赶

集。他把自行车停在路边，带我们回村子。我们边走边聊。据他介绍，他的女儿在1993年的大火中被毒烟呛昏，两个星期后神智才完全清醒，回家后抱着父母大哭了一场。1996年，她重到南方打工；1997年，回家结婚；婚后到西藏打工，没挣上钱，今年准备回家，至今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攒足。这几年，村子里的劳动力，特别是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工也越来越不好打了。

我们先到了廷英的家，一会儿工夫，一大群人把我们围在了中间，我们身上落满了好奇与疑问的目光。一个三十左右的年轻人狐疑地检查了我们的介绍信、学生证、身份证，才让开始采访。他是这个队的队长。廷英的哥哥不善言谈，他告诉我们他妹妹死时只有21岁，如果活着，现在该27岁了。廷英死后获得了25000元的赔偿费，部分用于廷英的丧事，其余的存到了信用社，现在已用得差不多了。哥哥到深圳处理他妹妹的后事时，被隔离起来，任何处理那场大火的文件都没有见到过，赔偿费也是当地政府通过邮局寄来的，他们对赔偿费很不满意。廷英的父亲也在人群中站着，他面容清瘦，沉默寡言，只是看着我们，跟着我们走，听他的儿子不太连贯地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也许是我们的突然来访又使他陷入到那可怕的回忆之中，他看起来更像一个听众，只有从他的双眼里才能看到那种失去爱女、无力回天的悲伤。

采访完毕，廷英的哥哥带我们去廷芳（死者）家。廷芳家屋前便是一湾茂盛的稻田。我们去的时候，廷芳的父亲正在地里干活，他扛着锄头赤着脚把我们迎到家里。廷芳死时才20岁，母亲一提起自己唯一的女儿，眼圈刷地一下便红了。她站在屋檐下望着我们，嘴唇蠕动着，想说什么，却不知从何说起。廷芳死时她唯一的弟弟还不足十岁。由于交不起学费，现在他辍学在家务农。我们问及他对她姐姐的印象，他看着我们只是腼腆地摇头。他父亲到深圳处理女儿后事时，是和廷英的哥哥一块去的，可是一下火车便分作两处。“我当时被关了三天，不许出来，也不许和别人交谈。”他心有余悸地告诉我们。出事后，廷芳家共获得赔偿25000元，除丧事外，他们用这笔钱到A镇修了房子。1994年春节前又收到葵涌镇政府寄来的由香港捐赠的1000元港币。此外，再没有得到过任何形式的帮助。廷芳出去打工是为了摆脱贫穷，可是她的这个任务是完不成了。采访结束后，廷芳的父母顺着田埂把我们送出了老远老远。

凌花也是受伤最重的打工妹之一。我们得知她在忠县B镇上住，便来到B镇，在马路上四处打听，找到凌花的哥哥。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告诉我们凌花原来开的小店因为生意不好关闭了。我们去的那天她在乡下村子里。

从B镇到BA村的那一段机耕道让我们难以忘怀。路上深坑密布，乱石突出，窄处仅容长安车车身通过，遇到烂泥坑时车直打滑，一不小心就陷到里边去了，怪不得不到10里路，少于60块钱没有一个司机愿去。凌花到村口来迎接我们，我们一眼就认出来了，她的脖子上有一片醒目的疤痕。凌花一跛一拐地领我们穿过稻田进村。我努力想象她受伤前健康的样子，那时她该是多么

轻快地就能穿过这片田野！大火改变了一切，她的肩、手、腿部均被严重烧伤，经过了一年多时间才慢慢恢复过来。当我们看到凌花因受伤而变形的脚时，感到十分震惊。凌花告诉我们，她现在基本上无法干农活，一到夏天，植皮部位无法排汗，特别难受。目前伤口老是破裂、化脓。出事后，凌花得到赔偿费和香港方面的慈善捐款共20多万，为了治疗方便，用一部分钱在镇上买了一套房子，加上几年来的医药费、手术费、生活费，赔偿费所剩无几了。还有一个亲戚借了她的钱，现在她需要用钱的时候却不肯还她。凌花办了一个残疾证，可是在办执照、买房、交农税方面没有享受到任何优待。两年前，凌花结了婚，她的丈夫也没有工作。勤快的凌花和我们谈话的时候，顺手拿起一颗玉米棒子，用残缺不全的手指费力地掰着。当问及她未来的打算时，凌花沉默了一下，说，“我也不知道，我想挣点钱，可是我这个样子怎么挣得上钱呢？前几年每年药费要花一万多块钱，这两年每年也要花四五千块。”我们和她一起沉默着，作为学生，我们能为她、为她们做什么呢？

凌花领我们采访了另一死者小梅的家人。小梅在致丽厂工作了4年，死时23岁。外出打工之前，小梅和同村的一个小伙子谈对象，本来已经领了结婚证，但是小梅还没挣出来为父母和弟弟盖房的钱，只好和未婚夫分两地继续打工。房子没有修好，小梅却永远地离去了。现在小梅父母和弟弟一家住的房子是用小梅的赔偿金低价从凌花那里买来的，但原来的房子还没有拆掉。这些情况都是同村人讲给我们听的。我们去看了小梅家原来的房子。那是几间斑驳破烂杂草丛生的房子，小梅的坟墓就在离这老房子不远的田湾里。小梅妈上坡干活，一出门就能看到小梅的坟墓，村里人告诉我们，他们有很多次看到小梅妈独自在坟前流泪，劝也劝不回去。现在小梅的弟弟也走上了他姐姐当年走过的道路：外出打工。我们默默祈祷他在外面能够平安顺畅，实现小梅没有来得及实现的心愿和梦想。采访结束时，王小梅一家用当地招待贵客的风味食品——荫米热情地款待了我们。

【这是一个太令人心酸的故事。小梅的未婚夫永成当时在上海打工。从致丽的信件中，我辨认出两封他从上海给小梅的信，一封写于1993年7月20日，一封写于1993年10月30日。永成在信中诉说着对小梅的思念，其中一段话今天读来触目惊心：“我在两个星期之前，曾做过一个梦，这个梦在脑海中印象太深……总想起来又像是有什么不祥的事，但又不全对，因此我又不想破解它，但又不能不破解。”难道真的有什么预感吗？就在信发出不久，小梅葬身火海，这一哀怨的爱情故事永远地凝固在了这些信上，也许会深埋在永成的心底。我没有见到小梅本人的文字，从家人的诉说和永成的信中，可以推测小梅并不愿长久地在外打工，为了弟弟，为了挣出家里盖房的钱，只

能服从父亲的安排，忍受与未婚夫天各一方的痛苦。但是，一个普通的打工妹，一个月几百元的收入，要想挣够盖房子的几万元谈何容易啊！在我得到的致丽玩具厂打工妹的资料中，有一张小梅上一年12月份的工资单，上面这样记录着：姓名：王小梅；出勤天数：30；日薪工资：43.10；超额奖：23.50；加班工资：52.80；记件工资：234.60；出勤工资：30；扣伙食：62.0；扣住宿：5.0；扣劳务：1.0；合计工资：316.0。12月，正是玩具生产的旺季，应当说这是小梅收入比较高的一个月。最终，她的死才换来了家里梦寐以求的房子。11月我们再次访问了小梅的家，小梅的母亲一提到女儿就哭了，诉说中带着对女儿的痛惜和对丈夫的抱怨。但我不忍心再说软弱而好面子的小梅的父亲什么，这些年来他已经承受了无止境的责难和自责，他的眼睛哭坏了，身体拖垮了。父亲当年也才44岁，没出过远门，连忠县县城也很少去。既然自己没有能力为自己和儿子盖房，他只能指望女儿。收到小梅出事的电报，他的精神已经垮掉了。到了广州，他哭得晕倒过去，还没到深圳已经花了一千多元治病钱。当时事故处理人员要他在处理意见书上签字，他觉得钱太少，但又不会讨价还价。他只是哭，不肯签。几天没吃饭。最终还是签了，“别人五六万，我三万三，我的命好苦。”可怜的父亲哭诉着，他实在是又悔又痛又无奈。——谭深 插]

告别了小梅一家，继续我们的寻找，多么希望我们寻找的那些人能鲜活地站在面前，至少能让我们看到她们平平凡凡地活着。遗憾的是，我们名单上的人大都在那场大火中丧生了。翠兰是这些不幸者中的一个。我们在C镇CA村寻访她的家。下了车，正好路边有一个小商店和一个小修理铺，五六个村里人围在柜台前。我问他们是否知道翠兰家在哪里住。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人回答。半天，一个妇女低声咕哝了一句：“你是问那个死了的翠兰？”我说：“是的。”一群人都围上来：“你们找她干什么？”可以想见，村里人突然遇到从北京来的陌生人询问几年前一个默默无闻的死者时脸上那惊讶的表情。一个妇女把我们领到了翠兰家。翠兰哥老远跑出来迎接我们，称我们为记者。他忙乱地给我们装烟、倒茶、让座，用手把长凳上的灰尘抹了好几次。翠兰死的时候只有16岁，还是个孩子。当时得到了3万多块钱的赔偿费。16岁与3万多块，这两个数字对我们来说极其沉重。翠兰的父亲今年67岁，一条腿摔成了残废，不能干农活，翠兰的死使他精神受了刺激，有点木讷。他知道我们为翠兰而来，蹲在旁边，但一言不发。翠兰哥不像许多死难者家属那样，没有注意保存文件，他把有关妹妹后事的文件保存得完好无缺，足有六七张。他告诉我们，他相信这些清单说不定会有用的，所以一直妥善地保存着。我看到他重新把这些清单折好，小心翼翼地放回到一个黑皮夹子里。他是一个有头脑的好哥哥。

与翠兰一起被烧死的还有她的堂姐淑兰，这是我们在遗留的信中没有找到的信息。从翠兰家到淑兰家只需走一段不足10米的石板路，姐妹俩在这个贫穷的山村院落里平安生活了10多年，却一起死在了异乡繁华的土地上。淑兰死的时候17岁，只比翠兰大一岁。这是此行我们见到的最凄惨的一家。淑兰遇难的噩耗传来时，她唯一的哥哥刚死去3天，正办后事。这对兄妹先后离去，接着嫂子也改嫁，留下一个6岁的女孩。残酷的命运摧毁了这个家庭，父亲从此落下“晕病”，经常晕倒在地里，母亲的身体状况也不好，干农活很吃力。家里已经没有人能够去深圳处理淑兰的后事，只好请一位邻居也是远亲帮忙去深圳。他们只得到25000元赔偿，因为淑兰的父亲当时未满60岁，母亲未满55岁，所以没有得到约为18000元的养老费。赔偿费大都用在淑兰的丧事和修房子上。父母每年都要花很多药钱，现在他家已欠了8000多元的债。我们去时，淑兰家空空荡荡的，堂屋里除了一张黑旧的八仙桌，几条歪歪斜斜的凳子和几件农具，再没有别的东西。孙女现在12岁，正是上学用钱的时候。谈到将来，淑兰的父母不知怎么办才好。也许他们唯一的希望便是12岁的孙女，孙女再长大几岁，可能便有办法了。我问：“这里有希望小学吗？”淑兰的父亲摇摇头。我不敢问他怎么设计孩子的未来，因为他连自己的现在都无法把握。

[第二次沿着泥土小路进村时，路上正碰见淑兰的妈妈和小侄女。淑兰的妈妈告诉我们，孙女上5年级，今天正好乡里统考，刚回来。她说，原来孩子的午饭都是从家里带，但是到乡里规定不能带饭，他们又没有钱，就给孩子带了一把花生当午饭。回到淑兰的家，他们一家老小三口和我们面对面，父亲已经被身心的痛苦折磨得疲惫而绝望，他坐在矮凳上默默无语，可怜的孩子睁着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但是那里面没有了天真，也看不到希望。我们临走时和他们一家留了个影。淑兰的妈妈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愿放开，我却突然看到淑兰的爸爸抱着头，蹲在地上，他的晕病又犯了。淑兰的妈妈说道，“他经常这样，别管他。”我们只得说着安慰的话，离开了。回到北京后，小孙女给我来信，告诉我奶奶摔伤了，又用掉几百元医药费。——谭深 插]

在采访过程中，我们边走边问。一个偶然的时机，听说BB村有一个叫秀雅的人，也在外出打工的时候被烧死了，但不知是不是致丽的。根据打听到的线索，我们找了一个农民做向导，冒着烈日赶到她家，在那里见到秀雅的公公和丈夫张禹。我们坐在他们的堂屋里开始谈了起来。开始的时候张禹一直沉默，只秀雅的公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六年过去了，又是这么伤心的事，谁也不愿再去回忆那些细节。张禹忧郁生活了一段时间，再婚并生了一个女儿。据张禹讲，秀雅在致丽厂工作的时候，每个月的工资只有400元出头，死后获赔35000元，其中有两万是保险公司赔的，厂里赔了15000元。厂里赔的15000元钱中包括安葬费和用于小孩的生活费8000元。张禹

说，孩子要上学，有时还要生病，所赔费用显然是不够的，他到深圳去处理后事的时候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当时太伤心了，精神都有些恍惚，根本就没有精力和心情去询问有关赔偿的细节。当我们问及后来厂方有什么追加赔偿没有，他说他不知道，但他自己是没有收到过什么东西。

[1999年11月份，我们有机会再次拜访了张禹。当时张禹去地里刨红薯了，被叫回的时候，两腿沾满着泥。他仍然显得那么忧郁，但由于我们熟了，他比第一次要健谈一些。六年过去了，对前妻的思念依然如故，他两次上楼找前妻的遗物给我们看，一次是找事故处理文件，一次是找前妻的照片，结果只找到一张秀雅的照片。他黯然地讲，他原将妻子的信和文件放在箱子里，但现在没有了，可能是现在的妻子怕他睹物思人，过于伤心，将秀雅的一部分信件和照片藏起来或毁掉了。照片上的秀雅年轻端庄，不像31岁的人。张禹难过地告诉我们，“这是她出事刚照的，还没来得及取。后来是老表帮取出来的。还有一张儿子的照片，寄给她可能也没收到。”秀雅外出时儿子才3岁，两年后遇难，一直没有回过家。她想孩子，就让丈夫寄孩子的照片给她，可是她来不及看到。那时儿子5岁，大人没有告诉他，他是从小伙伴那里知道的，小孩告诉他：“你妈死了”，儿子哭了，但是回家没问。原来这孩子爱说爱笑，很活泼的，后来也变得沉默寡言。父子二人的变化后来我们从张禹的妹妹建花那里再次得到证实，建花说，“嫂子死后，我哥的一家总是很忧愁的样子。”——谭深 插]

在残留的信中，有一个叫江芬的打工妹提到了“D综合商店”，提到了“雅美姐”。我们循着这两条线索到D镇去寻找。凑巧，我们所住旅馆的老板正是D综合商店的主管，他经营综合商店十几年来了，却从不知道有一个什么叫江芬或雅美的人，我们将信将疑，他向我们出示了身份证、工作证我们才得以确信。（第三次调查终于找到江芬和雅美的信息，而她们都已遇难。——谭深插）我们又经过两个多小时山间公路的颠簸，到D镇DA乡找另一信封上提到的陶秀明。DA现已改名，属另一乡，信封上的“道班”1992年已拆掉，而且道班中都是男同志，也没有听说打工妹死伤的事。无奈，我们只好快快而归。

[后来才知道，陶秀明就是本文开头我重点要寻找的那两位帮助哥哥上大学的姐妹中的姐姐，杨勤英是另外一个人。见下文“重庆：第三次追踪报告”——谭深 插]

带着疲惫和沉重，我们又来到忠县县城。忠县以豆腐乳出名，但我们无心品尝那美味的腐乳，

费尽周折寻找小英。小英的家在一个出入很不方便、曲里拐弯的胡同里，九层的楼房坐落在比路面低至少一米的地方。小英家在最高层，没有电梯，我们只好气喘吁吁地爬上去。敲了门，开门的正是小英。当我们见到小英时，才意识到，这样的条件对她来讲行动是多么困难。我一眼就看到她胳膊下的那只拐杖。她把门打开，颇费劲地让到一边，请我们进去，给我们让座，并力图用一只手给我们倒茶。我们赶紧劝住了她。我们不敢过多触及小英的伤痛与往事，但小英很大方，沉默了一会儿，便谈起了她所经历的事情。

火灾中，小英烧伤最严重，除头部外，其他部位几乎没有完好的皮肤。动了十多次手术，尚未痊愈，便被迫从南方医院出院。小英是躺在担架上被抬回家乡的。回家后，为便于治疗，在县城里买了一套房子（为了省钱，房子买在了九楼）。刚回家的时候，当地医院认为她根本没有活下去的可能，甚至拒绝接受她住院治疗。小英在床上躺了近一年，浑身疼痛，不能移动，不能翻身。她曾经丧失了生活的勇气，但家人的关怀和照料感动了她，她开始一边接受治疗，一边在父母的帮助下尝试做简单的锻炼。奇迹出现了，慢慢地，小英居然能坐起来了。1996年，她开始坐轮椅，半年后，又买了拐杖、人造脚掌。前年，她还挂着双拐，今年，她竟能拄着单拐在房内慢慢走动了。我们问小英能不能让我们看一看她的伤口。尽管小英的伤情早在我们的预料之中，但是当她的胳膊和腿上的伤口露出来的时候，我们还是感受到一种触目惊心的冲击：那是怎样的胳膊和腿啊！已经完全没有了胳膊和腿的形状，一只脚掌完全截掉了，冷冰冰的人造脚掌支撑着她身体的重量。小英告诉我们，她的伤口经常破裂、流血（我们看到她的裙子上还有伤口渗出的血印），稍一感冒，伤口便发烧、发肿，使她连下楼买药都做不到；天气热时，皮肤排不出汗，痛苦难忍。狠狠心买了个空调，电费太贵，又用不起。小英托我们在北京帮她打听，什么地方能治好这种烧伤后遗症。她对我们这两个从北京来的人寄予了无限希望。

小英受伤后，从厂方得到了赔偿费近10万元，香港一慈善机构又捐了16万元，这些钱她主要用在了继续治疗上。开始时住院、手术费动辄要几万元，后来伤口经常性地发作，每年都要用几千元，甚至上万元；买房子又花了近4万元。目前小英还想动一次手术，换一个轻一些的人造脚掌，但是钱已所剩无几。我们从不多的经费中拿出250元给了小英，但我们知道，这点钱连四分之一人造脚掌都买不到。

小英的父亲、母亲都是农民，今年都满60岁了。为了照顾女儿，他们搬来和女儿住在一起。小英的父亲靠在街边修鞋挣点钱补贴家用，但修鞋仍要交各种费用。小英告诉我们，“只有我自己出去修鞋才能免税，可是我这个样子连两斤菜都提不回家，怎么修得了鞋呢？”小英的妈妈年事已高，满头白发，因女儿出事受了打击，耳朵几乎聋了，但她仍一丝不苟地协助女儿治疗、锻炼，照料女儿的饮食、起居。看着连基本生活都不能自理的小英，我们真是难以想象六七年前那个初中刚毕业、头上总爱插着各种小饰物、活泼明快、对生活充满憧憬的小英的样子，我们更难

以想象，万一小英的父母有个三长两短，小英一个人该怎么生活？小英初中毕业没读高中便外出打工，没想到打工才一年多便出事了。懂事、要强的小英怎么也没料到如此残酷的命运竟会降临到她的头上——而当时她在致丽厂每月所挣的工资只有两百多元！这是一个令人垂泪的故事，为了她的哥哥上大学，19岁的小英付出了一生的代价。现在小英的哥哥在县里上班，单位效益一般，也不能给小英提供很多经济上的帮助，但他常回家看望妹妹。

虽然小英的心里充满了深不见底的忧伤，但她仍然流露出她天性中开朗、自强的一面。小英说，开始的时候，她根本不敢面对人们好奇的目光，只穿长袖衣服和老人才穿的鞋子，今年，她终于鼓起勇气穿上了凉鞋和裙子。小英还让我们看了她的卧室。她的卧室整洁、漂亮，和一般爱美的姑娘没什么两样，墙上还贴了两张电影明星的画。去年夏天，小英承受着天气炎热、皮肤不能排汗的苦楚，交了800块钱去学无线电修理，没想到学生的钱全被老师卷跑了。小英说，她特别想自食其力，可是自己日常生活都不能完全自理，自食其力从何谈起？她想开个卖部，可小卖部又挣不上钱，她仍然想出去打工，可谁会要她这样的残疾人呢？小英说，她恨那个香港老板，火灾给她身体上和心理上造成的伤害是无法弥补的。“老板不把打工的当人看，我们当时经常罢工。”小英的话使我们体会到一个残疾人生活的痛楚与辛酸，他们多么需要社会的理解和帮助！但我们知道，当一个人遭到巨大的劫难后，她最平常的生活全部被摧毁，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在根本上安慰她的。

小英的母亲一直在我们旁边坐着，她也许听不清楚我们在说些什么，但从她脸上的表情我们知道她听懂了我们谈话的内容。天快黑的时候，小英的父亲回来了，手中提着修鞋时供顾客坐的小凳子。小英的父亲很健谈，整整给我们讲了两个多小时小英的受伤及恢复情况。他清晰地记得六年前的每一个细节，甚至包括他们到深圳时住的房号、接待他的人的样子、每天的各种费用。女儿所受的灾难对他的打击实在太大了。当问及为什么小英伤未痊愈便出院时，他说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事故处理者强迫，如果不出院，就要将小英从广州南方医院转到镇医院，而医院里死人属常事，是不负责任的；二是当时正好香港一慈善机构提供捐款，他怕和有关部门闹翻了得不到捐款。无奈之下，他只好含泪领着女儿出院了。“当时我只是想，就算倾家荡产，也要把我的女儿救活。”我不知道，小英出院时，小英父亲所流下的泪水是不是一个父亲最后的泪水，因为我无法知道，那场夺去了他女儿健康和幸福的大火还将在他的心头燃烧多久……

告别小英后，我们乘船逆长江而上三个小时，来到了F镇。F镇古风犹存，清一色的旧瓦房，又窄又长的石板街，街两边排列着黑旧的木质店面。置身其中，你简直会怀疑这是拍古装戏的场所，而不敢相信这是一个现代化背景下的山区小镇。在这里，我们采访了另一个致丽大火死难打工妹的父母。死者叫谢霞，16岁初中毕业就外出打工。她年龄虽小干活却极为麻利。据谢母介

绍，谢霞在家的時候，每天早晨出去挑水，從山腳挑回家裏，連氣都不歇一口。謝母回憶起女兒的種種好處來，止不住悲從中來。“老天，為什麼偏偏就把她燒死了呢？！”她一再重複着這句話。謝霞死的時候只有19歲，正是花一般的年齡。在致麗廠，她是驗收員，最開始每月工資只有60多元，三年後加到了200多元。謝霞的姐姐原本也在致麗廠打工，發生火災時正好回家了，所以幸免于難。謝霞死後，家人獲賠25000元，當時謝霞的父親54歲，母親48歲，故賠償費中沒有養老費這一項。現在，謝父到了60歲，身體不好，根本無法干活，只好和謝母一起在F鎮上靠賣冰糕、飲料和其他小商品度日。我們就在謝霞父母的小店裏採訪他們，小店空間僅能容下三四個人，鎮上好奇的人便只好從店門外探進腦袋和半个肩膀來觀看也許是他們從未見過的採訪過程，偶爾插插話，提及謝霞生前的各種好處。我們的採訪持續了大約四十分鐘，這期間我留意了一下，謝霞父母只賣出了一只五毛錢的冰糕。

在採訪中我們也遇到了侥幸從那場大火中逃生的人。其中一個是吳小蓮。在打工妹們遺留下來的信件中，與吳小蓮相關的地址有三個，且都在不同的村鎮，我們只好憑運氣挨個去找，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後來在一個熱心人的帶領下，我們來到一個理髮店，開店的正是吳小蓮。小蓮看上去整潔、幹練，她熱情地用川味很濃的普通話和我們交談。在致麗大火發生前，她在那裏打了近一年工，剛開始工資500—600元，後來只上半天班，工資就降了下來。吳小蓮回憶說，火災發生時，卷閘門太緊，打不開，窗子又用鐵條封死，樓梯上堆滿了貨物，擠滿了逃命的打工妹。大家亂作一團，哭喊聲，尖叫声，咒罵聲響成一片。當時她在三樓，情急之中，順着樓梯扶手溜下來才逃出一條命來。家人得知致麗大火的消息，都以為她已經死了。吳小蓮雖然死裏逃生，但她從此再也忘不掉大火中伙伴們悲慘死去的景象。她逃出火海，回頭看見一個叫陶秀明的打工妹口吐鮮血，在煙火中倒地而亡；一個叫淑媛的姑娘也轉眼之間葬身火海。她看見她的姐妹們紛紛被燒死、踩死、熏死。在廠里她有一個最要好的朋友宛芬也被活活燒死。宛芬的父母到深圳領骨灰盒的時候，領回了一個別人的骨灰盒，後來返回深圳換了一個。小蓮至今也不敢肯定宛芬的骨灰是否真正回到了家鄉，回到了她的父母身邊。

採訪結束了。萬水千山，一路上的所見所聞使我們身心俱疲。川東山區農村美麗的自然風光同嚴酷的生活現實形成的強烈反差像楔子一樣楔入了我們的心里。被採訪的這些人，無論是死去的人、受傷的人，還是活着的人，只不過是致麗大火眾多受害者中的一部分，我們能用白紙黑字寫在這裏的，更只是他們巨大的苦難和殷殷企望中很少的一部分。但我們清楚地知道，六年前的那場大火尚未熄滅，它依然痛苦地燃燒在遭受劫難的生者心中。

這，就是我的姐妹們真實的故事。